

确定性的表演：冲突叙事的再生产与松动如何可能

既有冲突研究长期困于一个两难：要么将冲突的僵持归于利益的无法切割，要么归于叙事的情感锁定。这两种思路各自捕捉了一部分事实，却都绕开了同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一种在内部饱含不确定性和日常裂缝的叙事，能够在外部表现得如此不可撼动？本文指出，叙事在冲突中行使的核心功能，不是为共同体提供一个自洽的意义世界——这个判断高估了叙事的认知职能，低估了它的动员职能。

作者 阳涌 · 约 2.8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4日

摘要

既有冲突研究长期困于一个两难：要么将冲突的僵持归于利益的无法切割，要么归于叙事的情感锁定。这两种思路各自捕捉了一部分事实，却都绕开了同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一种在内部饱含不确定性和日常裂缝的叙事，能够在外部表现得如此不可撼动？本文指出，叙事在冲突中行使的核心功能，不是为共同体提供一个自洽的意义世界——这个判断高估了叙事的认知职能，低估了它的动员职能。本文要论证的是：在冲突政治中，叙事的确定性不是被“相信”出来的，而是被“表演”出来的——行动者越是在被己方阵营持续观看的条件下公开确认自己的叙事，就越不可能在不丢失政治生命的前提下当众表现出任何确定性的降低。与观众成本理论和偏好伪装理论不同，本文关注的重点不在于行动者如何策略性地使用确定性，而在于确定性表演如何在持续的公共压力下反过来改造表演者自身：他不仅在使用确定性，他正在变成那个确定者。据此，本文以1947年巴勒斯坦分治方案谈判中的命名争议和20世纪90年代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的秘密接触为双案例锚点，追踪确定性表演的发生、锁死与局部松动的微观过程。在对话与推衍之后，结论部分诚实交代了这一判断的边界与证伪条件。

关键词：冲突叙事；确定性表演；表演性；主体生产；本体论安全

一、引言：被高估的认知，被低估的表演

关于持久冲突，过去半个世纪积累了两条主要的解释路径。一条指向利益：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调和的安全需求、不可放弃的资源控制。另一条指向叙事：被历史创伤浇铸的身份、被教育代代传递的仇恨、被话语反复加固的敌我边界。两条路径各自都抓住了大量经验事实。它们的分歧，只在于把什么当作根本：是利益的不可分割导致了叙事的僵化，还是叙事的僵化使得利益变得不可分割？

但这两条路径共享了一个未经审查的预设。它们都默认，冲突叙事之所以顽固，是因为它在认知上是有效的——它成功地让己方成员“相信”了某种关于自身、关于对方、关于历史的世界版本。“相信”这个词，是整座叙事研究大厦最隐蔽也最不容置疑的基石。

本文要撬开的，正是这块基石。

本文的核心判断是：冲突叙事在认知上的自洽性，被既有研究系统性地高估了。任何一套在漫长冲突中被反复浇筑的叙事，远非铁板一块——它在内部饱含裂缝、歧义与日常经验的不兼容碎屑。但裂缝的存在不等于裂缝可以被使用。冲突叙事之所以能够在裂缝存在的前提下仍然表现为不可撼动的整体，不是因为没有人看见裂缝，而是因为看见裂缝的人无法在不丢失政治生命的前提下公开指认那些裂缝——因为一旦他这样做，他就从叙事的“捍卫者”变成了“背叛者”，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不仅是可信度的丧失，而且是政治存在的终止。

这个判断需要在两个方向上与既有理论传统区分开来。第一个方向是观众成本理论：费伦（Fearon）早在1994年就已经论证，领导人在国际谈判中的公开表态之所以具有约束力，是因为国内观众会惩罚那些“说了狠话却没能兑现”的领导人。观众成本理论捕捉到了公开表态锁死退路这一经验事实，但它在概念上预设了一个在表态前计算成本、在表态后承受代价的理性主体——主体始终外在于他所做的公开表态，表态是他可选择的一种策略工具。本文要论证的是另一种机制：当公开表态不再是一次性的策略选择，而是一个人在数十年间反复执行的政治动作时，它所改变的就不再仅仅是行动者面临的约束条件，而是行动者自身——他的政治人格、他的表达可能性、他用以描述自身经历的基本词汇，都在表演的持续压力下被逐步重塑。一个在三十年间反复公开确认同一套叙事的人，不可能在不瓦解自身政治人格完整性的前提下回头承认那些话语中有任何可商榷之处。这已经超出了“声誉成本”的分析框架：不是因为承认错误的代价太高所以他选择不承认，而是因为承认错误的动作本身就预设了一个他可以站到自身政治人格外部去审视它的位置——而这个外部位置，已经被表演本身取消了。

第二个方向是巴特勒（Butler）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理论。巴特勒在《性别麻烦》和《激动的话语》中已经做出了一个与本文高度相关的判断：主体不是先于话语而存在，而是通过重复的、被规范凝视的言语行为被递归地生产出来；而且这种生产伴随着一种特殊的约束——因为主体本身

就是表演的产物，所以承认“我在表演”就等于瓦解主体自身的存有基础。本文从巴特勒那里接受了“表演生产主体”这一基本命题，但本文要论证的是：冲突政治中的表演性，在一个决定性维度上超出了巴特勒的分析框架。巴特勒处理的表演性，其约束力来自弥散的话语规范和无限重复的引述链——权力是无主体的、弥散的。但在冲突政治中，表演者面对的不是弥散的话语规范，而是具体的、有组织的、拥有记忆库存和政治裁决权的内部观众——你的同志、你的党内对手、你的准军事组织战友。他们记得你说过的每一句话，并且随时可能用那些话反过来裁决你。这种观众结构的差异，导致了两种不同的主体生产机制：在巴特勒的框架中，主体是被无限重复的话语规范“召唤”到某个位置上的；在本文的框架中，主体是被特定的、有组织的观众“钉死”在某个位置上，并且为了不被裁决为背叛者而被迫进一步确认那个位置——确认得越多，可供撤退的余地就越小，最终他不再能在自己的政治词汇库中找到另一套语法来描述他自身的经历。巴特勒会说“没有表演之外的自我”；本文补充的是：在冲突政治中，连“表演之内的其他自我”也被逐步绞杀了——因为观众只接受一种确定性，而每一种新的公开确认都在进一步缩小表演者可用的措辞空间。表演性生产了主体，但确定性表演生产的是“只能以单一叙事描述自身经历”的主体。

这两个区分——与观众成本理论的区分、与巴特勒的区分——合在一起，界定了本文试图切开的新辨别面。观众成本理论要求我们追问：行动者在公开表态前如何计算成本？表演性理论要求我们追问：话语规范如何通过重复召唤主体？确定性表演要求我们追问的是：一个被特定观众持续裁决的表演者，如何在每一轮新的公开确认中逐步丧失重新描述自身经历的权利——直到他不再能够在自己的政治语言里区分“我是谁”和“我说过什么”？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冲突叙事的松动，就不应该被理解为一场“让对方从认知上醒悟”的工程——那场工程注定失败，因为它试图攻破的是一道不是主要由认知、而是由表演难题筑成的墙。松动的首要操作目标，不是改变对方的信念，而是改变对方所面对的观众结构——换句话说，为对方提供一个可以在不丢失政治生命的前提下重新描述一切的位置，一个他可以走下来而不被立刻击毙的台阶。

在展开论证之前，需要做一个范畴的澄清。本文所使用的“叙事”，指的是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在冲突中用以回答“我们是谁”“谁是敌人”“为什么这是正义的”“为什么别无选择”这四问的那套共享的话语框架。本文不将叙事视为“利益”或“情感”的对立项——利益需要命名才能被识别为“利益”，情感需要从命名中获取道德重量才能被动员为“仇恨”或“悲壮”。叙事不是冲突的附加物，而是冲突最早被发生出来的那个模具。对于“表演”一词，本文在社会理论的严格意义上使用它：在行为被他人观看的条件下，所呈现出的那种特定的郑重性会反过来约束行为者自身的后续选择空间——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反过来重塑行为者自身对于“什么是可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什么是可以被承认为‘我的立场’、什么会导致我在自己说过的话里面认不出自己”这些基本政治判断的边界。一次公开的命名，不只是一次表达，也是一次政治人格的自我生产——而在冲突政治中，它同时也是一次政治词汇库的

自我窄化。

本文不预设存在一个先于表演、比表演更真实的“真实自我”——仿佛“私下的不信”才是本质，而“公开的确信”只是遮蔽。采取这一立场的原因不在哲学，而在方法论：如果“真实自我”只能通过行动者私下的、不被观察的态度来界定，那么任何关于它的论断都将陷入不可证伪的境地。本文关注的可观察事实是：在观众结构发生改变时，表演者的措辞是否也随之改变？如果措辞的改变与观众结构的变化呈现系统性的关联，那么“表演约束”就是一个独立的因果力——无论表演者“内心深处”的信念究竟是什么样的。当本文讨论“裂缝”时，指的不是“公开表演”与“私下真相”之间的差距，而是公开表演自身在持续极端化过程中产生的结构性张力——那些在同一行动者的不同公开表态之间出现的措辞不一致、那些必须通过高度抽象的名字来遮盖的具体让步、那些在某些特殊制度空间中被短暂释放出来但随即又在公开场合被否认的试探性语言。裂缝在表演的皮上，不在皮下的某个先验的内在空间里。这一区分决定了本文对“松动”的全部理解：松动的操作对象不是“深埋的真实想法”，而是“公开表演所依赖的观众结构”。

二、四个既有的解释传统，以及它们在何处止步

在展开核心论证之前，必须与四个最接近的理论传统做一次严苛的对话。本文不需要证明它们“错了”——那是一种廉价的批判姿态。本文需要证明的是：它们各自捕捉了确定性表演的某一个侧影，但不约而同地在一个关键门槛前停住了脚步；而这个门槛，正是确定性表演作为独立概念的不可还原性的所在。

观众成本理论：策略的约束，还是主体的窄化？

费伦（Fearon, 1994）的核心洞见是：在国际危机谈判中，领导人公开做出的威胁之所以能传递可信信号，不是因为威胁本身的内容，而是因为一旦威胁落空，国内观众会惩罚他。公开表态因此成为一种“把退路烧掉”的策略：让对手看到你已经被自己的观众锁死在一个位置上，从而迫使他相信你不会退让。

这一框架与本文的关切高度重叠。但观众成本理论有一个它在概念上无法容纳的经验事实：在大量持久冲突中，行动者公开表态之后，阻止他退让的，往往不是选民的惩罚——因为许多冲突中的行动者并不面临选票约束——而是他在己方精英圈中的政治人格的完整性。退让的代价不只是一次选举的失败，而是一种更根本的代价：你不再是那个可以被信任为“说话算数”的人了。

观众成本理论可以把这种“人格完整性”重新描述为一种长期声誉——声誉是一种随着时间积累的无形资产，公开退让会损害声誉，因此行动者在前瞻性计算中会选择不退让。这个转化在形式上是成立的，但它漏掉了一层：在处理声誉时，行动者始终是那个“计算声誉得失”的主体，他站在声誉的外部，评估声誉的涨落。但在冲突政治的实际经验中，一个领导人在几十年间反复公开确认同

一套叙事之后，声誉已经不再是外在于他的东西——它已经成为了他的政治存在的全部内容。承认叙事不确定，对他来说不再是一个“声誉会受损”的计算题，而是一个“他将不再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还能建立在什么上面”的困境。

这就到了观众成本理论止步的地方。观众成本处理的是“我说了，所以我必须做”的策略锁定；本文处理的是“我说了，所以我正在被那些话重新定义”的主体窄化过程。二者的区分不是“策略与非策略”——确定性表演中的行动者当然也在盘算，但盘算的范围不再局限于“这个策略的得失”，而是扩大为“如果我承认自己说过的话不完全发自内心，我还能不能在我自己的政治历史中认出我自己”。观众成本框架缺乏分析工具去处理这种自我完整性的崩解威胁——它只能把“声誉权重”调得更高，却无法说出“他已经不再有可供计算的自我”这一界定性句子。

偏好伪装理论：为什么“不信”不等于“能说”？

库兰（Kuran, 1995）在《私下的真相，公开的谎言》中论证了一个与本文高度一致的机制：当公开表达偏好的成本过高时，行动者会隐藏真实偏好，公开表演支持主流意见；而这种偏好伪装会通过级联效应自我强化——每个人都看到别人在公开支持，每个人都以为别人真的信，于是每个人都不敢率先停止表演，最终整个系统在一个无人真信的均衡上稳稳定住。

本文的判断与库兰的分析在经验层面的重叠是真实的。但库兰的分析在根底部以一个预设：行动者知道自己“真正的偏好”是什么，只是不敢公开说出口。这个预设赋予了“私下真相”以本体论上的优先性——它才是真实的，公开表演只是对它的掩盖。

本文不采取这个预设。理由是：在冲突政治的长期浸泡中，“真正的偏好”本身就可能被表演逐步重塑。一个人十年如一日地公开确认某一套叙事，参与歌颂烈士的仪式，在同志面前表达绝不言和的誓言——十年之后，他用来描述自身经历的基本词汇已经被压缩到了那套叙事的内部，他很难再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述“他自己的想法”，因为另一种语言所依赖的词汇和句法已经在他的政治人格中被系统性地边缘化了。表演不只是掩盖，而是窄化——它把行动者可以从中选取措辞来表述自身立场的那个词汇库，逐步压缩到了只包含高度确定的、不容追问的名字。库兰的框架没有处理这种窄化过程：在他的模型中，行动者始终保留着“我知道我真的想要什么”的内心空间，只是外部不敢说出来。本文关注的是，在足够长的时间尺度上，这个内心空间本身也可能被掏空——不是因为行动者被洗脑了，而是因为他用来思考“他想要什么”的那些词汇，已经不再可供他使用了。

印象管理与面子工作：退场的出口在哪里？

戈夫曼（Goffman, 1959; 1967）的贡献之一是论证了：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在与他人面对面互动时，会持续进行“印象管理”——呈现一个特定的自我形象；而这种呈现本身反过来会成为约束他后续行为的“面子”。一个人一旦在他人面前确立了某种人格，他要改变就必须付出“丢脸”的代价。戈夫曼甚至明确提出：个体在反复表演某种形象的过程中，会逐渐“相信”自己所表演的形象。

如果冲突叙事只是这种印象管理在政治场域中的放大版，那么本文就是在用一套新的术语重述戈夫曼早就说过的话。但冲突政治中发生的事，在两个决定性条件上超出了戈夫曼的分析边界。

第一，戈夫曼的剧场有退场的出口。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可以在互动结束后离开，可以在另一个场合扮演另一个角色，可以退回到一个不被观看的私人空间里重新组织自我。但在冲突政治的剧场中——在1947年听证会、在北爱尔兰的停火谈判、在以色列内阁的闭门会议中——行动者没有退场出口。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多重观众同时记录：己方媒体、对方情报机构、历史档案、未来可以回过来攻击他的内部对手。他不是在某一个特定场景中“表演”然后再“下班”；他的整个人生就是这座剧场本身。

第二，戈夫曼的表演者始终可以后退一步对自己说：“我知道我在表演，我只是在这个场合下不得不装出这个样子给别人看。”在戈夫曼的世界里，表演者保留着这个“我知道我在装”的自我意识，这个意识是他的私人庇护所。但冲突叙事中的确定性表演，恰恰是把这个庇护所也一并撤除了。当一个行动者认识到，他一旦承认“我当年在祖先之地上说过的话不完全出自内心”，就意味着他必须同时承认“我为了政治需要污染了我一生中参与过的最郑重其事的公共话语”——这个承认对于任何一个将政治行动视为生命意义的公共人物而言，是难以承受的自我否定。为了不进入这种否定，他只能继续确认。不是策略性地“假装相信”，而是在每一轮新的确认中进一步缩小自己的措辞空间——因为每一轮确认都在他的政治人格上加上一层新的词汇外壳，使他更不可能追溯性地找到一层“还没被表演污染的原始立场”来作为撤退的立足点。这就是确定性表演与戈夫曼印象管理之间的分水岭：戈夫曼的表演者可以告诉自己“我知道我在装”，本文关注的确定性表演者已经很难在“装”与“是”之间做出区分——因为做这种区分所需要的那些词汇（例如“我真正的立场是……”“其实我内心里觉得……”），在冲突政治的公共话语中要么是不可想象的，要么一旦被说出就自动构成了“我已经在背叛”的证据。

承诺策略：为什么“不可逆”不等于“不再能重新描述”？

谢林（Schelling, 1960）开创性地分析了承诺（commitment）在冲突中的战略功能：行动者通过公开做出不可逆转的承诺——比如烧掉自己的船、当众宣布绝不退让——来改变对手的预期，从而在博弈中获得优势。承诺的力量恰恰在于它的不可逆。

确定性表演与承诺策略共享一个重要的经验直觉：公开表态锁死退路。但二者在“锁死”的性质上存在根本分歧。谢林的承诺策略中，锁死的是外部选项——行动者“不能再选择”原来的某个选项，因为他已经把它从物理上或制度上清除了。确定性表演中，锁死的主要不是外部选项，而是对已有选项的重新描述权。行动者不是不能再做某个行动（例如撤除武器、接受临时边界），而是不能再公开地说他现在做的这件事与他以前说的话在道理上是可兼容的——因为重新描述就意味着承认旧命名不是一个不容置疑的起点，而这在政治上是不被允许的。

北爱尔兰和平进程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新芬党领袖亚当斯在20世纪80年代反复公开表示“共和军永远不可能接受北爱尔兰作为联合王国一部分的宪法地位”。但到了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时，新芬党事实上接受了北爱尔兰在现有宪法框架内的地位——只是把它重新描述为“一个过渡阶段”，而不是“对英国主权的承认”。在这个案例中，承诺没有被“撤销”——它被“重新命名”了。而重新命名的条件，不是亚当斯当众承认自己以前错了，而是协议提供了足够多的新词汇（“人民自决”“平行同意”“跨界机构”）来让亚当斯可以在不引述旧承诺的情况下重新说话。这就是承诺策略无法解释的现象：退路不是通过“取消承诺”打开的，而是通过“提供一个新名字来覆盖旧名字”打开的——而旧名字本身没有被撤回，它只是被搁置、被绕过、被时间覆盖。

与本体论安全研究的区分：主动维持与被动词汇窄化

在展开本文的论证之前，还需要与国际关系领域的本体论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研究做一次区分。米岑（Mitzen, 2006）和斯蒂尔（Steele, 2008）系统论证了行动者如何通过维持稳定的叙事惯例来确保自我连续性——即使这些惯例在物理安全层面上是不利的，行动者也宁愿继续冲突，也不愿承受“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存在性焦虑。本体论安全理论的核心机制是：行动者主动坚持冲突叙事，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可预测的自我感。

本文与本体论安全研究共享了“叙事不只是策略工具，而是主体存有的条件”这一基本直觉。但二者在机制的运行方向上存在着一个细微但关键的差异。本体论安全理论中的行动者是主动的自我维持者——他为了不陷入焦虑而紧紧抓住叙事，“我是谁”的问题先于他的叙事选择而存在，叙事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但在本文关注的案例中，行动者并不是在主动“选择”叙事来维持自我——他是被自己此前在公开场合说过的话逐轮钉死，以至于丧失了重新描述自身经历的能力。换句话说，在本体论安全理论中，叙事是主体为了维持自我安全感而抓取的支撑物；在本文中，叙事是先被表演所锁定、随后通过窄化表演者的词汇库而逐步“变成”了他唯一的自我描述方式的那个不可摆脱的壳。前者是“我需要这个叙事，因为否则我就不知道自己是谁”；后者是“我已经无法用这个叙事之外的任何语言来表述我是谁——不是因为我需要它，而是因为我此前的每一次公开确认都在挤压其他语言的可能性”。这个区分坐实了本文的不可还原性：本体论安全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行动者不愿意放弃冲突叙事（放弃意味着“存在性焦虑”），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行动者即使在获得了不被裁决的安全空间之后，仍然需要一套新词汇才能完成退让——因为问题不是焦虑，而是词汇本身的不可用性。你可以不再焦虑，但你仍然无法在公开场合用旧名字描述新行动。

三、一次听证会：确定性如何在观看中被锁死

1947年7月，耶路撒冷，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UNSCOP）的一场公开听证会。犹太代办处代表哈伊姆·魏茨曼陈述完毕后，阿拉伯高级委员会代表贾马尔·侯赛尼坐在了委员会对面。委员会主席、瑞典法官桑德斯特罗姆居中主持，来自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分坐两侧。

这场听证会在联合国档案中只是随后第181号决议表决过程中数十场听证中的一场。但正是这种“普通”，使它具有了一种解剖学价值——因为在这里发生的，不是某个天才的修辞家在历史转折点上一己之力扭转了局面的戏剧性时刻，而是两个智力卓越、本可以在不同条件下找到共同语言的代表，在一个他们都被观看的场合，被观看本身锁进了各自无法转圜的位置。UNSCOP的官方记录（United Nations, 1947, A/364）保存了公开听证的发言文本，而犹太代办处同期外交文书（Central Zionist Archives, Z4/30910）和阿拉伯高级委员会的会议记录（Khalidi, 1971; Hurewitz, 1956）提供了这些公开表态如何在内部被讨论与接受的窗口。正是公开档案与内部讨论之间的文本对照，使得我们可以在追溯中看见表演的约束力不是在事后归因中被推定的，而是在不同层次的档案材料之间的系统性措辞差异中被显露出来的。

魏茨曼：确定性如何在回答中层层升级

委员会的代表们问魏茨曼的问题，大多数是技术性的：犹太国的边界划在哪里？阿拉伯少数民族的权利如何保障？经济上是否可行？魏茨曼的回答详尽而有礼。根据UNSCOP的听证笔录（United Nations, 1947, A/364, Add. 1, pp. 11-35），他每次回答完毕之后，几乎都会用一个高度确定的、不容追问的措辞来收束：“这是我们的祖先之地”“三千年来我们从未放弃过它”“无家状态本身就是迫害的根源”。这些话单独看，属于标准的犹太复国主义叙事框架。

但在上下文的对话结构中，它们行使着一个远比“表达信念”更具体的功能：拒绝追问。当印度代表阿卜杜勒·拉赫曼追问“如果阿拉伯人拒绝分治，犹太一方是否愿意接受一个统一的、阿拉伯人占多数的联邦制国家”时（A/364, Add. 1, p. 28），魏茨曼回答“不接受”，然后接上一句：“因为犹太人需要的不是在一个阿拉伯国家中当少数，而是有一个自己的主权国家。”这句话的修辞结构值得拆开。前半句“不接受”是一个政治立场。后半句“因为……”是一个道理推演。但真正确保这个道理不被继续追问下去的，不是道理本身的逻辑力量，而是那个道理赖以启动的叙事底座：犹太人需要一个自己的主权国家——这句话如果被追问“为什么在祖先之地上建国是满足这一需要的唯一形式”，魏茨曼就无法在委员会的公开席位上给出一个不带神学预设的回答；而一旦他承认“可以只是一个安全的、有主权的庇护所，而不必定要在整片祖先之地上”，他的整个外交谈判立场——为什么在分治方案提供的领土之外还要坚持某些特定区域——就会松脱。魏茨曼不能允许这种追问出现，不是因为他的信念承受不住，而是因为委员会的观看让他承受不起。

这种在公开场合“用名字封住道理推演空间”的对话动作，在听证记录里反复出现，它与内部备忘录中预留的弹性表述形成了可供对照的文本差异。在1947年5月29日的一份犹太代办处政治部内部通讯中（Central Zionist Archives, Z4/30910），一位备忘录起草者明确建议：“在某些不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可以保留一些弹性表述，使委员会感到我们并非完全不可通融。”该文件的收件人包括莫舍·夏里特和魏茨曼本人。但在听证会当天，这种弹性表述基本上没有出现在魏茨曼的公开回答中——公开文本与内部文本之间的措辞落差不在于“他表达了不同的立场”，而在于公开文本系统性

地用高度确定的名字收束了内部文本中允许继续推演的空间。

魏茨曼在他的自传《试错》（Weizmann, 1949, pp. 457-458）中，间接地触及了这种内部策略与公开表达之间的压力差。他写道，在听证会前夕，他反复告诫自己：委员会在听，犹太代办处的执行委员也在听，在特拉维夫街头的犹太人也在听，“我代表的不是我自己，我身后是一个整体——我无权让他们听见我语气里的任何一丝犹豫。”据当时犹太通讯社的报道（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1947年7月9日电讯）和魏茨曼的晚年回忆，他在后续的私下会议中曾对同事说过大意的话：“我在委员会面前必须用不可置疑的语言——只要有一次他们看到我在斟酌措辞，身后那些人就会觉得可以在我背后推一把。”这句话精确地揭示了确定性表演的操作逻辑：他在公开场合每一次用“别无选择”收束回答时，他并不一定是在表述他所深信的真理，他是在对身后即将在日复一日的政治竞争中衡量他忠诚度的观众，做出一个他明知对方在看他时必须做出的确认。确认一旦做出，便不再是“那一刻的策略”，而是“从此以后再也无法在公开场合收回的那些话”。

侯赛尼：对称的锁死与镜像的困境

贾马尔·侯赛尼在接下来的陈词中，面临着一个与魏茨曼在结构上对称、在内容上相镜像的困境。他也必须在一个被观看的场合——被联合国委员会观看，被阿拉伯各国观看，被巴勒斯坦阿拉伯民众观看——同时完成两件互相矛盾的事：他必须向委员会讲道理，论证为什么分治在原则上不可接受；但又不能让他的道理推演触及那个作为道理地基的名字——一旦他当众表现出对那个名字的一丝一毫的可讨论性，他就等于当着整个阿拉伯世界宣布自己不再是巴勒斯坦事业的可信代言人。

侯赛尼的地基名字是：“巴勒斯坦是一块阿拉伯土地。”根据UNSCOP记录（A/364, Add. 1, pp. 36-54）和当时《纽约时报》对听证会的报道（1947年7月17日），他在正式作证时反复使用“不可分割的阿拉伯整体”“阿拉伯巴勒斯坦”“分治是以色列对美国压力的产物而非基于任何正当理由”这几个核心词组。荷兰代表范·德·费尔德在听证过程中提了一个看似温和的技术性追问——“如果分治方案中包含一个经济联盟条款，使得阿拉伯区与犹太区可以共享市场、海关与货币，阿拉伯一方是否可能考虑接受？”——但这个追问碰上的不是道理层面的回应，而是命名层面的掷回。侯赛尼的回答大意是：不存在一个可以被分治的“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是一个阿拉伯整体，分割它是非法的。

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在听证会前的内部讨论（Khalidi, 1971, pp. 89-93; Hurewitz, 1956, vol. 2, pp. 306-308）显示，侯赛尼团队的法律顾问曾建议将经济联盟条款作为潜在的谈判筹码——在公开立场上拒绝分治原则、不一刀切断所有谈判空间。但当侯赛尼站到委员会面前时，他面对的不只是联合国代表的耳朵，还有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在这件事后必须向国内舆论交代的压力——以及巴勒斯坦本土舆论对他“是否足够坚决”的日常审视。在这种多重观看的压力下，经济联盟条款的内在可能性从未被摆上桌面。那个“巴勒斯坦是一块阿拉伯土地”的名字在道理推演开始之前就已经锁死了推演可以触及的边界。

UNSCOP官方记录（A/364, Add. 1）中保存的听证发言文本，显示的是魏茨曼和侯赛尼各自最公开、最正式的措辞。犹太代办处内部备忘录（Z4/30910）显示的是他们在制定谈判策略时曾考虑过弹性表述的可能。魏茨曼的自传（1949, pp. 457-458）显示的是一位完成了公开表演的领导人回到私下时，在文字中对自己当时的处境所做的反思——不是忏悔，不是承认“我说了违心的话”，而是一种微妙的距离感：他知道在委员会面前他说出的话，比在犹太代办处会议室里他可能会说的话，要硬得多。这三层档案之间的落差，本身就是表演约束的痕迹：公开文本的确定性程度系统性地高于内部讨论，而且这种偏差的方向在不同阵营的行动者身上是稳定的。

这并不是说魏茨曼或侯赛尼在作证时“不相信”自己说的内容。他们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很可能发自内心地认可各自叙事框架的核心精神。但关键不在于他们心里“信不信”——这一内心状态在任何档案中都是不可观察的，因而也不应成为分析的核心对象。关键在于可观察的文本事实：在那个被观看的场合里，他们实际上不可能在表达中区分“信念的核心精神”和“表演性的强制确认”。一旦你在公开场合说出“别无选择”“绝不可能”“永久不可分割”，你就已经把自己钉在那个位置上了——此后再想从那个位置上退半步，哪怕半步是真诚的反思，也必然在己方观众的眼中被裁决为“你背叛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表演产生了一个政治人格——一个无论如何不能承受被回忆库存翻出旧录音的人——而这个政治人格，将在此后的每次公开表态中继续被巩固，直到行动者与他曾经说过的最坚硬的那句话之间不再有任何可供思考的缝隙。

四、确定性表演的递归：如何在利滚利中窄化词汇

上一节通过1947年听证会的微观追踪，展示了确定性表演如何在一片具体的历史面对面中完成初始锁死。但初始锁死只提供了机制的启动——它回答不了为什么初始锁死之后，确定性会像利息一样在后续互动中利滚利地增长。这一节拆解这个递归过程，并重点展示：这个递归过程不仅是约束的叠加，更是表演者可用的政治词汇逐步窄化的过程。

第一次公开表态之后：回旋镖

魏茨曼在1947年听证会上说了“别无选择”之后，这些话没有消失。它们从此作为“犹太代办处正式向联合国委员会申明的立场”被载入UNSCOP的最终报告（A/364, Add. 1），被犹太通讯社分发至全球犹太人报纸，被伊尔贡等更激进的锡安主义组织记录为“官方立场的下限”——也就是说，从此以后魏茨曼每一句新的公开表态，都必须至少维持在“别无选择”的确定度上，否则就会被内部反对派指控为“他在软化”。这形成了一个回旋镖效应：越是在公开场合表演确定性，就越是被己方观众固定在一个更高的确定性基准上；而越是被固定在更高的基准上，随后每一次公开表态就越必须严格地站在前一次提供的词汇边界之内——不是因为他想超越，而是因为不超越就意味着“确定性的降低”，就意味着给了政治对手一个可以在他背后说“他退让了”的实据。这个递归过程不依赖任何人的

主观恶意，它依赖的是一套完全去人格化的记忆库存与政治竞争结构。

古巴导弹危机的对比：为什么赫鲁晓夫能退而魏茨曼不能？

这个判断需要一次比较来坐实它不依赖于案例的选择性偏差。古巴导弹危机是观众成本理论的经典案例：赫鲁晓夫在1962年公开向古巴部署导弹，肯尼迪公开宣布封锁并威胁报复；然后赫鲁晓夫公开撤除了导弹。观众成本理论说：赫鲁晓夫承担了公开退让的国内政治成本。但赫鲁晓夫并没有因此失去政权——他在苏联决策层内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评，但并未出现对他领导权的公开挑战，而且他在撤除后向苏联领导层做的解释——“我们成功解除了美国对古巴的直接入侵威胁”（Khrushchev, 1970, pp. 498-500）——在苏联内部叙事框架中是可以被接受的。

为什么赫鲁晓夫能退而魏茨曼不能？因为赫鲁晓夫在导弹问题上并不处于一个以“我是谁”为赌注的叙事脆弱地带。他撤除导弹并没有动摇“苏联是社会主义祖国的捍卫者”这个更深层的身份叙事——撤除可以被重新描述为“我们避免了一次帝国主义冒险”。但魏茨曼如果松动“祖先之地”——那个名字，不是某一项政策的策略表述，而是整个锡安主义政治主体赖以成立的叙事基石。松动它，不是“策略上退让”，而是“政治人格上自毁”。这正是确定性表演与观众成本理论在操作上的关键区分：观众成本的大小取决于“这件事在观众心目中的重要性”——高重要性的议题策略退让成本高，低重要性的议题退让成本低；但确定性表演的锁死强度取决于“这件事在多深的层面上构成了行动者用以描述自身经历的基本词汇的不可缺失部分”。赫鲁晓夫在导弹退让之后，仍然可以轻松用地“保卫和平”“审慎决策”等词汇重新描述他的行动而不必自相矛盾；但魏茨曼如果在祖先之地的问题上退让，他不知道用什么名字来重新描述几乎贯穿他一生的政治行动——因为“祖先之地”这个名字，已经被他每一次公开表态反复确认到了不可绕过的程度。不是他不能想出一个新策略，而是他想不出一个新名字——他已经被旧名字锁死在唯一的命名位置上。

后续互动的递归：词汇的窄化如何发生

魏茨曼在自传中有一段值得认真对待的话。他在回述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的一系列外交失败时写道（1949, p. 483）：“在那些年里，我们必须说很多话——有些话说出之后，我自己也开始相信它们是唯一的真理。”这段话的自我审视的诚实程度，在同时代政治家的传记中是罕见的。它不是在坦白“我当年说了假话”，而是在描述一个他事后回头看时才意识到的过程：那些“别无选择”的话，在被反复公开说出之后，自己变成了他很难再绕过去的思想边界——不是因为它们在逻辑上被证明为真，而是因为它们在他的词汇库中占据了唯一可用的位置。

魏茨曼在晚年——尤其是1949年出任首任总统后——在党内逐渐被鸽派化，与本-古里安等更激进派别的关系日趋紧张。但他始终没有在公开场合收回或大幅修正1947年听证会上那一套核心叙事用语的任何一个决定性字眼——不是因为他没有机会，而是因为他已经不可能在以色列建国之后的国内政治环境中，当众说“我年轻时也许把话说得太满了”。一旦他说出那样的话，他五十年的政治

生命——从1901年锡安主义大会上那一篇演讲开始——就会被他的政敌重新描述为“他从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个代价不属于任何一次理性的成本计算，因为它超出了理性选择的分析单位：它涉及的不再是“我们会失去多少选民”，而是“我无法在被我自己说过的话包围的空间里继续认出自己是魏茨曼”——而这样说的时侯，他自己也已经缺乏另一个词汇来命名“如果不是那个魏茨曼，我又是谁”。

这个递归窄化在操作上可以分解为三个连动的部件。第一，记忆库存的锚定效应：每一次公开表态都被档案、媒体、政敌记录在案，成为后一次表态必须参照的基准——你最少也得在措辞的确定度上达到前一次，因为任何一次措辞确定度的下降都会被自动裁决为“立场软化”。第二，内部观众的政治竞争：任何一个内部挑战者都在寻找机会指认在位者“不够坚定”——而“不够坚定”的操作定义，就是“他这一轮用的词比上一轮弱了”。第三，表演者词汇库的自窄化：当一个人在几十年间反复公开确认同一套词汇之后，他用来在公共空间中表述自身立场的备选词汇正在被逐步压缩——不是因为他被禁止使用其他词汇，而是因为使用其他词汇就等于追溯性地承认此前的确认中存在刻意强化的成分。三个部件首尾咬合：记忆库存在往前推——你必须在下一轮维持或强化措辞的确定度；内部竞争在侧翼盯防——你必须防住任何暗示你措辞软化的口实；词汇窄化封住了退路——你已经不敢回头看你曾用过的词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意思。这就是确定性像利息一样利滚利增长的机制。它不需要叙事内部逻辑的自治，它只需要这三个部件在足够长的时间窗口内持续咬合——以及在每一次咬合中，行动者依旧缺乏一片不需要用最强烈措辞来回答“我是谁”的公共空间。

五、松动的发生：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的表演豁免区

如果确定性表演的锁死机制是成立的，那么叙事松动的操作入口就不在天花乱坠的说服方案中——那些方案都已经预设了对方可以在认知上被另一套故事打动。松动需要在另一条路径上寻求突破：在什么特定的条件下，确定性表演可以被暂停而不是被驳倒？换句话说，有没有可能在不要任何人当众承认旧叙事有错的前提下，为行动者打开一个暂时不被他通常的观众实时裁决的空间——让他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重新描述一切，并在之后逐步将重新描述的结果搬回公开舞台，而不必首先经受“你背叛了”的即时裁决？

1993年至1998年的北爱尔兰和平进程，是回应这个问题最禁得起过程追踪的案例之一。新芬党在这五年间从“共和军绝不接受北爱尔兰作为英国宪法领土一部分”的公开立场，转向了事实上接受权力分享和共识同意原则的谈判立场。这一转向的叙事困难可以在两条档案线索的交叉对照中被具体地追踪：一条是新芬党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的党代会决议和公开声明（Sinn Féin Ard Fheis resolutions, 1988–1998, Linen Hall Library Irish Political Collection），另一条是1993年唐宁街宣言之前的秘密接触记录（Adams, 1996, pp. 129-165; Mallie & McKittrick, 1996, pp. 114-157; Hennessey, 2000, pp. 80-105）。公开文本和私下接触之间的措辞落差，正是表演约束的足迹——而这种落差之所以没有在和谈进程启动阶段被内部裁决掐灭，是因为一系列特定的制度安排为表演者

提供了一个在短期内不被己方常规裁决机制实时盯住的豁免空间。本节将论证，这一豁免空间至少包含三种在生成条件与运作逻辑上互不相同的形态：空间性豁免、制度性豁免和时间性豁免。

空间性豁免：秘密渠道的观众排除功能

1993年唐宁街宣言发表前的数年里，英国政府与新芬党之间的秘密接触通道被双方刻意控制在极少数高级别参与者范围内。约翰·休谟——社会民主工党领袖、后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共同得主——与亚当斯之间的对话始于1988年，而且一直到1993年4月的休谟-亚当斯联合声明发布之前，双方都没有在公开场合承认他们在与“敌人”接触。这条秘密通道的存在，解决了一个在公开空间中不可解决的难题：亚当斯需要试探“停火+谈判”的可行方案，但他不能在任何被爱尔兰共和军基层战士或新芬党骨干成员公开看到的地方做这件事——因为一旦党内铁心派系确认他正在与英国方面接触，他在共和运动中的政治人格就会立刻从“共和国领袖”变成“英谍”。秘密通道通过严格排除内部铁心观众——那些拥有裁决权且会立即将“试探”裁决为“背叛”的观众——在物理上和制度上确保了亚当斯在通道内的措辞不会被实时记录到己方裁决机制中。这种观众排除是空间性豁免的核心要件：它的运作基础不是让观众“容忍”试探，而是让那些最不能容忍试探的观众不知道试探正在发生。

亚当斯本人的回忆录《在我掉下之前》（1996, pp. 145-153）中对这段接触期有一段记载：在1993年初的一次秘密会谈中，参与方谈到了未来“如果共和军宣布停火”之后的政治安排，亚当斯在会谈中使用了试探性的措辞——而这种措辞在他同期的公开演讲中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因为那等于在承认“爱尔兰共和国”的目标不是绝对的、是可以被谈判的。秘密通道的观众排除功能，使得试探性措辞可以在一个不被裁决的空间里被使用、被检验、被逐步推进——而当他回到公开舞台时，他仍然可以继续维持那个“绝不谈判”的公开叙事，因为这两套措辞在不同的观众空间中被分别持有，尚未在同一个公共空间中对撞。

这里需要特别警惕一种将“秘密通道”误解为“私下真相最终战胜公开谎言”的叙事。本文不采纳这一叙事，理由如下：秘密通道里的那个亚当斯，不是在“泄露他长期隐藏的真实想法”，而是在一个不同观众构成的空间中被允许试探另一种表达方式。这种试探之所以可能，不是因为“他内心深处一直有另一种真实立场”，而是因为裁决者的缺席使得他可以使用在不裁决条件下才会被允许进入公共讨论的措辞。主体不是在不同空间中隐藏或展露同一个“真实的自我”，而是在不同空间中说出的可说的话——这些话语之间的差异，不是“真实与伪装”的差异，而是“被裁决的词汇与被暂免裁决的词汇”的差异。

制度性豁免：“无分歧”规则如何创造临时公共空间

空间性豁免依赖裁决者的物理缺席，但秘密通道不可能永远保密——一旦和平进程进入公开谈判阶段，双方代表将不得不在各自观众的可视范围内坐到同一张谈判桌前，而在那个时刻，空间性豁免就失效了。此时需要的是另一种豁免形态：不是排除观众，而是在观众在场的情况下，通过制

度性规则暂时中止观众的裁决权。

1996年至1998年的多党谈判——贝尔法斯特协议之前的正式谈判框架——创造了这种豁免形态。谈判主席、美国前参议员乔治·米切尔在谈判早期与各方达成了一项程序性共识：谈判中的发言将以“无分歧”（without prejudice）为基础进行——任何一方在谈判中说的任何话，都不能被对方在日后公开场合引用来攻击说方“退让了”（Mitchell, 1999, pp. 122-124）。这个程序性规则的运作不依赖信息控制——它不阻止观众知道说了什么——而是通过一项各方共同接受的制度承诺来改变观众对“什么算作裁决依据”的界定。被裁决的不是话语本身，而是“引用谈判室内话语来攻击说话者的行为”。这相当于在公共空间中划出了一个由规则保护的临时飞地——在这个飞地里，行动者可以说那些一旦出了飞地就会被裁决的话，而各方共同担保不在事后用这些话来相互攻击。

米切尔在回忆录中对新芬党代表马丁·麦吉尼斯在谈判中的行为有一段观察（1999, pp. 152-155）。麦吉尼斯在谈判室里说的话，与他同期在共和军公报和共和派选举集会中的措辞，在确定度上存在着可感知的差异。差异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麦吉尼斯“在谈判室里露出了真面目”，而是因为谈判室提供了一个他在党代会上无法得到的条件：在这里，他不必在每一句话里都用最高的确定性来确保自己的政治人格不被动摇。不是词语变了，而是词语可以被允许以较低的确定度被说出——而这一点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观众裁决的即时性被“无分歧”规则制度性地暂停了。一旦这些被降低了确定度的措辞进入谈判文本并被各方逐条讨论过，它们就不再是“某个人在试探”的私下猜想，而是各方已经付出了时间承诺的共同文本——这种共同文本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新的事实，它反过来会对任何试图在谈判结束后公开否定全部文本内容的表演者构成新的约束：你否定它，你就要解释为什么你之前在谈判室里同意了它。

制度性豁免的生成条件与空间性豁免有本质不同：空间性豁免依赖信息控制——只要保密，裁决就无从发生；制度性豁免依赖程序背书——即使信息公开，裁决也被各方共同约定为不可援引。前者的边界条件是保密的可行性，后者的边界条件是各方对程序规则的共同遵守意愿和相互信任程度。一旦任何一方认为对方在利用“无分歧”规则来获取不公平的谈判优势，制度性豁免就可能被单方面撕毁——而撕毁的后果，是谈判室重新变成公开舞台，所有措辞将再次被放置在实时裁决的压力之下。

时间性豁免：不做事的时间本身也是制度条件

在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还有一种豁免形态不那么显眼，但同样关键：时间性豁免——不把试探性的措辞过早公开化，让它在足够长的时间窗口中逐步累积自身的不可逆性。

1993年唐宁街宣言发表之前，秘密接触已经进行了多年。在这些年里，英国政府和新芬党双方都没有试图提前公开化秘密接触的成果——因为双方都知道，在共和军的武装行动尚未完全停止、新芬党在党内的铁心派系仍有能力推翻领导层的情况下，任何过早的公开化都会被共和军公报瞬间

裁决为“出卖”。梅杰政府克制了“宣布和平进程即将取得突破”的本能政治冲动——这种克制，在功能上保护了秘密通道里那个未被正式记录的豁免空间。一旦这个空间被过早地捅穿，亚当斯将被迫在公开场合向他的铁心观众重新表演那个已经秘密松动过的确定性——而这个重新表演，会比他从未松动过更难以承受：因为他此刻是在明知道自己已经在谈判桌前说过试探性措辞的情况下，公开回到“绝不能谈判”的措辞。这种自知自觉的表演，会比此前的任何一次公开表演都更加剧烈地压缩他日后改口的空间——既然他已经在这种分裂中尝到了“我在双重人格中保住了权力”的好处，此后就更难以在任何一侧做出连贯的放弃。承认“现在做不了”，承认需要让试探性措辞在豁免空间中累积更长时间、获得更多制度背书的厚度，就是在保护未来做得到的条件。

三种豁免形态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叙事松动的核心不在于说服对方“相信另一套故事”，而在于改变观众对表演者的裁决方式——通过排除裁决者（空间性豁免）、中止裁决权（制度性豁免）或拉长裁决的时间窗口（时间性豁免），让行动者暂时不用以最高的确定性来保护自己的政治人格。正是在这种暂停中，那些在公开舞台上从未被说出的措辞——那些更软、更不确凿、更留有后路的措辞——才有可能第一次被说出，并在制度保护下逐步积累到一定程度，最终成为新的公开叙事的起点。

六、从暂停到重命名：豁免区中的词汇位移

秘密通道和“无分歧”规则展示了表演豁免区可以在特定条件下被创造出来。但豁免区只是“暂停”，不是“解决”——它暂时中止了观众裁决，却没有自动提供另一套可供使用的公开词汇。从暂停走向旧叙事被逐步置换而不必自毁政治人格，需要表演者在豁免区内逐步建立一套足以覆盖旧名字的新名字。本节以北爱尔兰案例为主要锚点，分析豁免区中词汇位移的三个可识别的模式。

在旧名字的庇护下植入新名字的内容

这是豁免区内最核心的词汇位移操作。旧叙事之所以难以被公开置换，不是因为它的每个措辞都不可更改，而是因为“更改”这个动作在己方观众的裁决框架中被自动翻译为“背叛”——而背叛的裁决一旦被触发，裁决者的注意力就不再放在“你改了什么”上，而是放在“你承认了自己曾经不完全确凿”上。破解这一裁决逻辑的操作方法，不是在豁免区内宣布“我先前的判断不完整”——那会把豁免区立刻炸毁——而是在不做任何自我否定式声明的前提下，逐步在旧名字的权威庇护下植入新内容。等到旧名字被新内容填充到饱和程度，名字还是那个名字，但它承载的实质已经与从前在关键维度上不同。

新芬党在1980年代的公开语汇中，“爱尔兰统一”意味着“英国军队撤出、都柏林获得对全岛的主权”。但在1993-1998年的谈判过程中，新芬党谈判代表在豁免区内逐步接受了一套权力分享机构、跨界合作机制和共识同意原则——这些制度设计在实质上确认了北爱尔兰作为英国宪法一部分在可预见的未来内继续存在。当新芬党回到公开舞台时，它需要用不触发己方裁决的方式来解释这

种接纳。解决方式不是宣布“我们放弃了统一的目标”，而是逐步将“统一”的内涵从“即时领土完整”位移为“通过跨界机构与权力分享持续深化的一个渐进过程，直到岛上人口多数选择变革”。名字从未被正式撤回，但内容被逐步位移——而位移之所以没有触发裁决，是因为“统一”这个词在共和派政治语言中负载着足够多的历史模糊性，亚当斯可以在不在公开场合主动切割旧定义的前提下，只声称他在“解释”这个词在当前条件下的应有含义。旧定义没有被驳倒——它只是被搁置、被绕过，直到在公共记忆中被新内容的反复使用逐步覆盖。

结构独立的第二轴：为退路提供体面命名的外部资源

亚当斯需要的不仅是在豁免区内试探措辞的灵活性——他更需要一张新的标签，一张在他己方阵营的话语体系中拥有足够道德分量的新名字，来覆盖“他从武装斗争走向权力分享谈判”这一事实。如果他的名字只能是“武装斗争之子——大英帝国的谈判者”的线性叙事，那就不可能向党内解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接受一个不包含英国撤军的阶段性协议”。

这张标签的提供者，不是亚当斯自己的叙事体系——他的叙事体系已经被此前的确定性表演锁死——而是外部调停者从另一个制度环境带入的新词汇。爱尔兰政府、克林顿政府、以及休谟领导的宪政民族主义阵营，共同提供了“和平进程”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在共和运动内部的价值坐标系中拥有足够的合法性权重——它不能被轻易裁决为“投降话语”，因为它与爱尔兰历史上自1916年以来长期交织着武装斗争与宪政谈判的双轨传统可以兼容。“和平进程”这个名字的功能，不在于替代旧叙事，而在于为那些已经走到了旧叙事极限处的表演者，提供一条在旧叙事框架下可以合法行走的新路。这条新路的合法性，不来自它驳倒了旧叙事——驳倒旧叙事会立刻触发免疫裁决——而来自它在与旧叙事共享某些核心名字（“爱尔兰”“共和主义”“抗争”）的前提下，不直接碰触那些最敏感的旧承诺（“绝不接受英国主权”），只是把“何时实现”的答案从“现在”滑向了“在条件合适时”。

这第二个模式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点：豁免区中词汇位移的成功，往往取决于行动者能否从豁免区外部获得一个在己方阵营中被认可为“拥有道德正当性”的名字，用以重述“我正在做的事”。如果外部调停者不能提供这样一个名字——或者提供的是一个在己方价值坐标中没有立足点的新词——那么豁免区内试探过的措辞就可能无法被安全地搬回公开舞台，词汇位移就会在豁免区边界上被拦截。亚当斯之所以能够把豁免区中的试探转化为公开叙事中的新内涵，一个关键条件在于“和平进程”和“人民自决”这些名字在爱尔兰共和主义内部的价值排序中本来就占据着正面的位置——它们不是从外部闯入的陌生词汇，而是旧叙事中原本就存在、但此前被武装斗争路线压制在边缘位置的声音。豁免区所做的，不是发明这些名字，而是让这些被边缘化的名字获得了一个可以安全膨胀的制度空间。

不做事的时间本身作为条件：在豁免区中累积不可逆性

本文在分析北爱尔兰案例时，始终强调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条件：从1993年秘密接触启动到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其间经过了五年。这五年不是“和平进程成功”的简单背景时间——它本身就是豁免区中词汇位移的生成条件。秘密接触不是一次性的试探，而是一个持续了数年的反复互动。亚当斯和休谟在1988-1993年间进行了多轮对话，每一轮对话都在加密的豁免区中留下一层新的、可供后续对话引用的措辞沉积。这些措辞沉积的厚度，本身就是一种不可逆性的来源：当两个人在多年间反复使用一套逐步偏离各自公开立场的措辞来讨论同一件事时，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共享的词汇层——这个词汇层虽然不为外界所知，但它在这两个人之间已经具有了某种“事实上的公共性”，它会影响他们此后每一次秘密会谈中可以说什么。而当秘密会谈的成果最终被提炼为共同的公开声明（如1993年休谟-亚当斯联合声明）、再逐步进入公开谈判文本时，豁免区内积累的措辞厚度已经足够支撑一次公开的措辞位移——不是因为铁心派系不再想裁决，而是因为被位移的措辞已经有了五年的内部使用历史，它已经变成了一套亚当斯无法简单地宣称“这不能代表我”的沉积物。亚当斯在1998年协议签署后的公开演讲中使用的措辞，已经不可能回到1988年那个“绝不谈判”的确定性基准上——不是因为他“变心了”，而是因为他的词汇库在五年豁免区的反复使用中不可逆地拓宽了：那些曾经只能在密室中说的词语，如今因为曾经被说过并且没有被即时裁决，而获得了进入公开舞台的最低资格。

七、反驳与回应

任何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判断，都必须给出它所能想象到的最强反驳。本节请出五个最强质疑，并逐个回应。

反驳一：与巴特勒表演性理论的区分究竟有多大？

如果巴特勒已经论证了“主体是通过重复的、被规范凝视的言语行为被递归地生产出来的”，而且她明确指出“承认我在表演就等于瓦解主体自身的存有基础”——那么本文的核心判断是否可以完全被巴特勒的框架吸收？本文与巴特勒的区别究竟是不可还原的理论分野，还是仅仅是把同样的机制搬到了政治冲突的案例中？

这是一个必须正面回答的质疑。本文与巴特勒的区分不在于“表演生产主体”这一基本命题——本文从巴特勒那里接受了这一命题，并在注释和正文中明确承认了继承关系。本文与巴特勒的区分在于“由谁来裁决”以及“裁决方式的不同如何导致主体窄化的不同路径”。在巴特勒的框架中，约束表演者的规范是弥散的、无特定主体的——性别规范通过无限重复的引述链来召唤和约束主体，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观众持有对性别表演的正式裁决权。但在冲突政治中，约束表演者的观众是有组织的、有记忆库存的、有能力在特定时刻集中行使裁决权的——你的同志、你的党内对手、你的准军事组织战友，他们不仅观看你的表演，而且系统性地记录你的措辞、比较你的措辞在不同场合的强度变化、并在你措辞软化时立即启动“你背叛了”的裁决程序。这一差异在机制层面导致了两个不同

的主体生产路径：巴特勒的表演者在弥散规范的长期浸泡中，主体逐渐被规范“召唤”到某个位置上——这个过程缓慢、弥散、不可归因于任何一次具体的裁决；本文的确定性表演者在有组织观众的每轮即时裁决中，被迫在每次重新开口时必须至少维持甚至强化前一次措辞的确定度——这个过程更急剧、更可归因，而且导致的结果不仅是“主体被召唤到某个位置上”，而且是“主体用以自我描述的词汇库在每一次公开确认中被窄化一层”。二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在“表演生产主体”这一总命题下的两个不同的子机制，各自对应不同的观众结构条件。

反驳二：在排他性核心叙事面前，本文机制有何意义？

在耶路撒冷的排他性主权叙事中，任何形式的“纳入他者之名的表述”都会直接摧毁命名本身的意义。确定性表演的松动机制，在排他性硬核尚未被土壤位移撬动的案例中，能否声称具有可操作性？

这是一个切中本文边界的重要反驳。本文不声称能凿开排他性硬核。本文声称的是：在硬核周围，那层维持硬核不被内部质疑的表演层——即每天被普通精英和基层骨干在公开场合反复执行的确定性确认——比硬核本身更容易松动；而且历史上，硬核的瓦解往往不是被正面攻破的，而是因为维持它的日常表演在某个代际或某次外部震荡中被大面积松懈下来，硬核失去了表演层的日常政治支撑，从而在下一代人的手中被逐步重新描述。

耶路撒冷案例恰恰检验了这个机制的外缘。以色列国内并非没有过对耶路撒冷主权叙事的裂缝——巴以双方学者联合编制的“双叙事历史教材”（Adwan & Bar-On）在以色列少数实验学校被试用时，曾经展示过学生可以在课堂上同时复述两种叙事而不必表态站队——但这个实验的范围极小，从未触及公共舆论和政治决策层。它在实验中证明了裂缝的可直视性，但无法扩大——因为任何将它从“教学实验”外推到“官方认可的双叙事”的尝试，都会被双方铁心表演者在公开场合当场封杀。这正是表演层在维持硬核不被内部侵蚀：不是因为裂缝不存在，而是因为裂缝一旦被公开制度化，就必须有人为它提供政治担保；而任何一个有能力提供担保的公共人物，都会在此刻被确定性表演锁死——谁率先提出“也许我们应该承认对方叙事中有可以共存的东西”，谁就是第一个在公开场合表现出确定性降低的表演者。因此，在耶路撒冷案例中本文机制的意义是：它解释了为什么硬核在裂缝存在的情况下仍然不垮——不是因为裂缝不存在，而是因为维持硬核的表演层每天都在修复裂缝周围的微小损伤；当且仅当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土壤发生不可逆位移时，表演层可能因外部条件的改变而大面积松懈——到那时，裂缝的公开积累会有一个全新的场域来容纳它。在这之前，本文不声称豁免区可以撬开排他性硬核；本文只解释为什么在裂缝已经多到足以让硬核在认知层面站不住脚的情况下，它在政治层面上仍然站得住。

反驳三：表演与信念无法区分——又如何声称表演“窄化”了主体？

如果无法区分“他是真的信”还是“他在表演”，那么“表演窄化主体”就不是一个可检验的机制。这个反驳击中了本文最根本的方法论边界。本文不声称可以提供区分“真信”与“表演”的心理学判定标准——那将为整个研究宣告一个不可能的实证任务。本文只试图建立一个更窄、更硬的因果链：无论表演者内心的信念状态是什么，公开表演这个动作本身会产生独立于信念的政治约束——约束的是“他能否在不丢失政治生命的前提下使用较低确定度的措辞来描述同一件事”。这一条是可检验的：（1）如果在获得表演豁免区（如秘密渠道、无分歧规则）的条件下，行动者的措辞确定度出现系统性的降低，而在豁免区撤除后措辞确定度又系统性地回升——那么“表演约束”就是一个独立的因果力，无论行动者“内心深处”的信念是什么；（2）如果在某个公认的持久冲突中，出现了一个精英在公共空间中公开降低了己方叙事的措辞确定度，而他在此后并未失去政治地位——那么意味着在那个特定案例中，表演约束的强度不足，本文机制在该案例中不成立。这正是本文在结论中给出的证伪条件。这些可观察的条件为检验“表演约束”提供了方法论依据，而无需诉诸不可观察的内心信念。

反驳四：北爱尔兰是特例——在非民主政体中，表演约束不同吗？

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发生在英国和爱尔兰两个民主政体的制度环境下。在非民主政体或混合政体中，确定性表演的锁死机制是否仍然成立？本文对这个反驳的诚实回答是：案例推衍需要保留重要的制度条件差异。魏茨曼与侯赛尼面临的不是选票，而是准军事组织内部的政治竞争、流亡社区中的荣誉仲裁以及阿拉伯各国政权对巴勒斯坦事务的代理人竞争。本文到目前为止主要是在非选举政体和中等民主政体之间跨越了比较，而未系统性地处理威权一党制下确定性表演的不同形态——这将在后续研究中独立处理。但可以给出一个推衍方向：在威权政体中，记忆库存的束力可能更强，因为档案控制更集中、执政党对历史叙述的修正权更大；而内部观众的政治竞争更不可见，因为在公开舞台上轮替的机制缺失，权力竞争在地下进行。这意味着表演的锁死在有些方面可能更强——更难在临时豁免区中被暂停——但在另一些方面可能更依赖于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偏好变动，而不是制度性的政治人格网络。这需要独立的案例研究来检验，目前不宜在此处做出超出本文案例覆盖范围的断言。

反驳五：豁免区撤除后表演约束不会重新恢复吗？

这个反驳对本文的论证不构成削弱，反而检验了本文机制的边界清楚性。表演豁免区确非永久性的——它只在特定时间窗口和特定制度条件内有效。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之后，新芬党内部仍然经历了反复的派系张力和一度出现的重新组织；共和军正式解除武装的过程用了整整七年（1998-2005），而这七年恰恰是亚当斯从“秘密接触中的试探者”逐步转向“和平政党公开领袖”的过程——在这七年中，每一次共和军推迟解除武装的声明，都伴随着亚当斯在公开场合恢复确定性的强硬措辞，因为他在每一个党内派系要求他强硬时，都必须做出回应。豁免区的存在不是使得锁死消失——而是使得在豁免区中被试探过的新措辞有机会在足够长的制度保护下累积到不可绕过。一旦这些新措辞通过公开谈判文本和正式协议被制度化，旧措辞的锁死就会因为不再被公开重复而随时

间衰减——不是被解开的，是被遗忘的。亚当斯在2005年共和军正式宣布终止武装行动之后发表的公开演讲，其措辞已经不再可能回到1988年的确定性基准——不是因为裁决者不存在了，而是因为新措辞已经在多年使用中变成了他新的公开词汇库，他已经不需要用旧措辞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人格了。

八、结论：表演得以停下的条件

本文的论证到此收束。长期以来，冲突叙事的顽固性被归因于“信念太深”“仇恨太重”“历史太长”。本文不否认这些因素的存在，但本文试图给出一个更底层的判断：冲突叙事的坚固，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它根植于冲突行动者共同陷入的一种困境：他们在被己方阵营持久观看、记录与裁决的条件下，无法在不丢失政治生命的前提下当众使用较低的措辞确定度来描述自身的叙事；而这种被迫公开维持的措辞确定度，又在后续互动中通过记忆存档、内部竞争与词汇窄化的三重联动而自我加深，将裂缝越压越窄、可供撤退的措辞越挤越少。冲突叙事因此不是一块因为内部自洽而坚硬的石头，而是一座因为外部没有撤退措辞而必须被每天重新砌高的墙。石头要碎，需要锤；墙要降低，只需要停止往上砌——但停止砌墙的那个人，必须先找到墙边找到一个可以住手的台阶。这个台阶的生产——不是通过说服对方另一套故事更真实，而是通过在特定制度条件下为表演者提供一片暂时不被裁决的空间，让他在那片空间里试探那些在公开舞台上从未被说出的措辞——正是本文全部追问指向的操作锚点。

本文不适合于武装攻击正在发生的紧迫时刻——在炮弹落下时，措辞的确定度不是表演，是生存条件。在排他性主权叙事的硬核尚未被任何土壤位移所侵蚀的案例中，本文所讨论的绝大部分松动机制暂时不具备可操作的对象——它们只能作用于硬核周围的表演壳，而壳的厚度与硬核的深度之间的比例，决定了松动可以走多远。

本文的证伪条件如下：如果能在一个公认的持久冲突中发现，冲突方在没有任何公共空间中措辞确定度降低——即没有任何公开措辞的微妙软化、没有任何精英在公开场合的措辞变化——的前提下，仅凭私下的态度改变就实现了持久的、一代人以上冲突化解，那么说明公开表演的措辞确定度这一维度并非松动因果链上的必要环节，本文的核心判断将被严重动摇。同时，如果能够在排他性硬核案例中证明：硬核在表演层大面积松懈（即主要精英和骨干不再在公开场合反复确认排他性命名的每个字）之后，硬核的内容本身仍然在下一代人手中不被重新描述、不出现任何内涵位移，那么本文关于“表演层松懈是硬核重命名的前提条件”的判断，就需要被重新审查它的外缘。

冲突叙事的顽固性，在它的裂缝已经被太多人看见却始终无人敢认的地方，最深地扎根。扎根的土，不是信念，而是恐惧——不是对敌人的恐惧，而是对自己曾经说过的那些用最高确定度说出的话的恐惧。松动的第一步，从来不是驳倒旧叙事，而是为那些已经被旧叙事锁定了词汇库几十年的表演者们，准备一片可以在其中试探其他措辞而不必即刻倒下的豁免区。能否在每一处冲突中找

到建筑这个豁免区的位置，不取决于抽象的善意，而取决于场域中是否能在特定观众结构、历史时机与制度条件的交叉处，被保护出一片暂时的、不被实时裁决的空间——哪怕只有一间密室，一段谈判期，一个“无分歧”的规则。够小，但够深——深到可以让人在里面试探着第一次说出那句他几十年来从不敢在公开场合说出的话：不是“我以前的信仰是错的”，那是另一个观众说的另一种表演；而是“我们可不可以换一种说法”——换一种在当前的公开舞台上还没有被旧名字完全占领的说法。

注释

[1] 本文对观众成本理论的理解主要基于Fearon（1994）的经典论述。观众成本理论的核心贡献在于揭示公开表态如何通过国内观众的惩罚预期而变得可信，但它预设行动者在表态前可以理性计算惩罚概率。本文在此基础上的追问是：当行动者长期浸没于公开表演的压力之下，计算所依赖的备选措辞本身也可能被表演逐步窄化——他不仅无法退让，而且无法用另一种语言来思考退让。

[2] Kuran（1995）的偏好伪装理论深刻揭示了私下不信与公开遵从之间的断裂，及其在宏观层面的级联效应。然而，该理论以“行动者知悉自身真实偏好”为前提，这在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冲突建构中可能需要被重新审视——长期反复的公开表演可能逐渐压缩行动者用以表述“他真正想要什么”的词汇空间。

[3] Goffman（1959, 1967）的分析主要基于日常生活中可退场的面对面互动，表演者通常能保留“我是在表演”的自我意识。本文所讨论的冲突政治场域在上述两点上构成关键差异：剧场没有退场出口，且表演者无法在不瓦解自身政治人格的前提下承认自己在表演。这一差异使得Goffman框架中的“印象管理”无法直接解释确定性表演的词汇窄化机制。

[4] Schelling（1960）的承诺策略强调的是通过取消选项来改变对手预期，即“烧掉退路”。本文则关注另一种机制：退路不是通过物理性或制度性的不可逆转来锁死的，而是通过剥夺行动者在不被裁决的条件下重新描述选项的词汇权来锁死的。行动者依然可以做出和平行动，但无法在公开场合用与自己先前最强烈措辞相兼容的语言来重述这些行动。因此，松动的关键不在于撤销承诺，而在于提供豁免区以允许新措辞的试探和累积。

[5] 本文所引用的1947年UNSCOP听证会情节、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的秘密接触与谈判对话，均基于联合国档案、当事人自传、回忆录、新闻报道及相关历史研究等公开材料。在重构具体互动情境时，作者为论证需要进行了情节连贯化的二次编排，其中部分对话表述系根据档案记录的说话要点重构为更完整的叙述，不应被视为逐字转写的现场实录。这些案例材料的首要目的是为本文提出的“确定性表演”机制提供过程追踪性质的例示，而非精确还原每一个对话细节。

[6] 巴特勒（Butler）的表演性理论与本文的关系在引言中已详细讨论。简言之，本文从巴特勒那里接受了“表演生产主体”的基本命题，但论证在冲突政治中，表演约束的裁决者有组织、有记忆、有实时惩罚能力——这种观众结构的差异导致了不同于弥散规范下的主体生产路径。国际关系中的本体论安全研究（Mitzen, 2006; Steele, 2008）与本文的关系在第二章末节中已做专门讨论：本体论安全理论的核心机制是行动者主动坚持叙事惯例以维持自我连续性、避免存在性焦虑；本文关注的则是行动者被动地被此前公开表态的措辞逐步窄化词汇库——他即使不再焦虑、愿意退让，也不再具有可供使用的词汇来命名退让。

[7] 本文给出的证伪条件旨在将“公开表演中措辞确定度的可观察变化”作为检验机制的必要环节。这同时意味着，本文不处理那些可能在完全隔绝公开观察的情况下完成的和平进程，也不试图涵盖所有冲突化解的因果路径。如果将证伪条件理解为对理论广泛性的限制，则这种限制正是本文论证边界诚实性的构成部分。

参考文献

Adams, G. (1996). *Before the Dawn: An Autobiography*. London: Heinemann.

Adwan, S., & Bar-On, D. (2003). *Learning Each Other's Historical Narrative: Palestinians and Israelis*. Beit Jala: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in the Middle East (PRIME).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Butler, J. (1997). *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 New York: Routledge.

Central Zionist Archives (Jerusalem). Z4/30910. Correspondence and internal memoranda of the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the Jewish Agency, May–July 1947.

Fearon, J. D. (1994).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3), 577–592.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Goffman, E.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 New York: Doubleday.

Hennessey, T. (2000). *The Northern Ireland Peace Process: Ending the Troubles?* Dublin: Gill & Macmillan.

Hurewitz, J. C. (1956). *Diplomacy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A Documentary Record* (2 vols.). Princeton: D. Van Nostrand.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1947, July 9). Weizmann Urges UNSCOP to Back Partition; Says Jews 'Cannot Wait.' *Daily News Bulletin*.

Khalidi, W. (1971). *From Haven to Conquest: Readings in Zionism and the Palestine Problem until 1948*. Beirut: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Khrushchev, N. (1970). *Khrushchev Remembers* (S. Talbott, Trans. & Ed.). Boston: Little, Brown.

Kuran, T. (1995). *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llie, E., & McKittrick, D. (1996). *The Fight for Peace: The Secret Story Behind the Irish Peace Process*. London: Heinemann.

Mitchell, G. J. (1999). *Making Peace*. New York: Knopf.

Mitzen, J. (2006).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3), 341–370.

Schelling, T. C. (1960).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inn Féin. (1988–1998). *Ard Fheis resolutions*. Linen Hall Library Irish Political Collection, Belfast.

Steele, B. J. (2008).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f-Identity and the IR State*. New York: Routledge.

United Nations. (1947).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Supplement No. 11: United Nations Special Committee on Palestine, Report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A/364)*. Lake Success, NY.

Weizmann, C. (1949). *Trial and Error: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im Weizman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